
日本政治变动及其对华影响

——一种结构、生态与政策的演化视角

吴怀中

内容提要：2012 年日本政权更替，为从政党结构、政治生态和政策倾向三个维度考察从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治变迁及其对外影响提供了线索。通过着重分析“结构保守化”、“生态右倾化”和“政策正常化”三个核心变量，可以顺势研判政治体制及自民党政权前景、涉外政治生态及思潮的变化、战略及政策倾向性等日本政治演变的重要特征和趋向。这种特征和趋向，将会通过相对稳定的保守政权的主导，在涉及“价值观”、利益纷争和军事安全等的政策领域，给中日关系带来不断的影响和考验。

关键词：日本政治 政党结构 政治生态 政策倾向 中日关系

作者简介：吴怀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13) 02-0016-18

根据政治学理论，考察一国的政治情况，可以从政治生态（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政治结构（政府、政党和政治人等）、政治行为（政策制定、行政治理等）这三个维度来进行。^①外交是政治的延续，要分析日本内政变化对对外关系的影响，也大致可以通过动态地考察政治结构与自民党执政前景、涉外政治生态与价值取向、战略志向与政策偏好这三组直接影响因素来开展。

初步的迹象表明，在从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治变动和政权更替期里，日本政治已经或正在显示出：政局在总体保守化态势中从不稳定到一定时段内的相对稳定、涉外政治生态持续发生明显的右倾化、政策显示出“国防正常化”的强烈志向等重要的演进趋势。这同时也意味着，

^① 参见杨光斌主编《政治学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

未来几年内（2~4年），日本的对华政策可能会以谋求全面“大国化”为背景，在政权相对稳定、战略谋划“深远”、政策比较统一的国内政治条件下得到推行。比起此前三年的民主党政权，自民党安倍政权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外争端及国际博弈、军事对峙与抗衡等方面，有可能展开更为积极的对华拼抢战略，展示软硬两手并用不“悖”的姿态。对此，中国要有足够的心理和对策准备，在对日外交的思维和方法上适时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

一 总体保守化与外交的价值取向

经过2009年的选举，两大政党间的政权更替被认为在日本已基本成型。但2012年大选中，民主党势力遭受重大挫折，两大政党制被认为前景不明，将来的日本政党体制让人难以预断。目前，日本政坛形势出现了一个优势保守大党加上若干政党并立的混乱状态。^①从不同的角度看，这种局面同时具有准一党优势制与准两党制的若干中间性特征。那么，日本目前的政党体制究竟如何？^②从制度因素来看，小选区和比例代表的混合选举制使大党容易胜出，同时也给中小政党留下活路，在形式上造成“多党”局面，但在指向上则使政党体制的光谱向“准两党制”发生倾斜和位移。^③从社会因素看，诸多的局限使得英美标准意义上的两党制政治结构往往难产并容易震荡。可以说，日本政治精英层设计的“造党”选举制度遇到了内外复杂因素的作用及干扰。以此而言，目前日本的政党体制或许是介于“准一党优势制”和“准两党制”（不完全两党制）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初步具备一党优势胜选形态下

① 具体局面为：最大党的自民党（独大党、优势党）、中偏大型的民主党、偏小型的日本维新会和公明党、小型的大家党和共产党、若干个十名议员左右或以下的微小型党。

② 国内外学者从制度、社会和心理等因素出发对日本政治体制的判断，就每个阶段的日本政治而言都有其合理性。例如，高洪、王新生和李阎楠等曾认为日本难以产生真正的两党制结构，徐万胜和李莹等倾向于认为日本正在产生新的一党优位体制，周杰和李海鹏等则认为日本正在形成准两党制模式，包霞琴和张伯玉等曾认为日本“两大政党制”基本形成。

③ 日本的混合选举制目的之一，即是用比例代表制来调节和平衡多数代表制（小选区制）的非比例性，但自1996年以来的选举历史证明，日本式的比例代表制是一种追加式（而非补偿式）的设计——小选区与比例代表区的席位不挂钩，小选区得票率与议席率的非比例性无法从比例代表制中得到补偿，即比例的议席仅仅是为了弥补小选区非比例性不足而追加的议席。

的（两党）政权可更替的特征，但尚未充分成熟和稳定下来。^①至于将来的政党体制究竟如何，现阶段还难以给出明确的答案，还要经过数轮分化离合的政坛演剧才能见分晓。

日本的政党体制长期动荡，但日本的大政治格局在冷战后走势清晰，也就是“总保守化”并没有囿于政坛混乱而一直在持续深入地发展。^②2012 年大选之前，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保守政党的政策已经日渐趋同。大选之后，中右和极右势力全面兴盛，总保守化得以更上一层楼。其原因是，美国“重返”纵容日本“政治解禁”、岛屿争端后的“中国威胁论”和安全危机感发酵、经济低迷和社会不安等。在这种内外形势下，中道及中左势力很难独立做强，多是通过“联保”或“入保”来维持一定的生存空间与牵制能力。^③因而，当前日本政党体制的总体形态和格局，是保守党优势形态下的多党并立，保守优势的形式也许是（准）一党优位状态，有时候也可能是分裂的两党或多党情形。这从表 1 的相关数据就可以看出，2005 年后的三次大选中，两大保守政党在小选区的平均议席率超过 90%，在比例区的平均议席率近 70%。而在 2012 年的大选中，几乎形成保守一边倒局面，保守政党众议院议席达到 90% 以上（参见图 1）。^④在这种趋势中，目前可以得到验证的是：自民党克服多次分裂作为一个超级保守政党存续，其相对稳固的程度是其他政党所无法比拟的。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特别的意外发生，自民党将作为一个具有很大优势的中心政党存在。

① 政治学的相关分析认为，政党轮替体制的转型和完成，是需要 20～30 年的时间的。此外，在日本，只要众议院目前的选举制度（以小选区为中心的制度）继续存在，政党的数目就不得不减少并集中。同时，2012 年自、公、民三党达成的协议已经表明要大幅削减比例区议员的数目，这将进一步有利于大党的胜选。

② 关于日本总体保守化的形成和发展，参见吕耀东《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③ 民主党处于一种两难境地：如果采取野田的“纯化路线”而转型为纯粹保守政党，那么将作为自民党第二而被淹没；反之，如果采取鸠山式的温和“中道路线”（含“中道保守”），那么在总体保守化和美国强势压制的情况下，政权都难以维持。不过，另一方面，极右虽有一定的市场，在国政及议会拥有一席之地，但日本国民总体上对极右还是有抵触和过敏心理的，不会放手让其议席和势力过分扩张。

④ 各党所获议席总数（众参两院议席数）为：自民党 376（294+82）、民主党 144（57+87）、日本维新会 57（54+3）、公明党 50（31+19）、大家党 30（18+12）、共产党 14（8+6）、未来党 9、生活党 8、社民党 6（2+4）、绿风党 5 等。

表 1 日本两大党最近三次大选的

	得票率与议席率		
	(%)		
	2005 年	2009 年	2012 年
	议席率	议席率	议席率
小选区第一党	73.0	73.9	79
小选区第二党	17.3	21.4	9
以上总比率	90.3	95.3	88
比例区第一党	38.2	48.3	31.6
比例区第二党	33.9	30.3	16.6
以上总比率	76.2	78.3	4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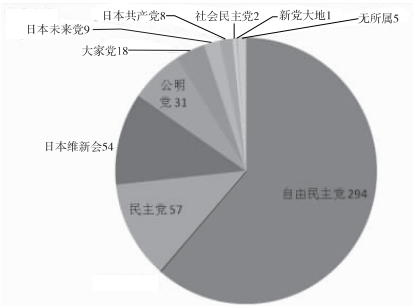


图 1 2012 年大选后的党派议席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有关日本大选的相关资料作成（以下同）。

日本的中长期政党体制难以稳定，但在总体保守化形势下，在中短期内（2~4 年）形成由自民党保守政权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小康状态”却是可能的。在这方面，比起先天不足且后天没有补好的民主党来说，自民党具有有利的条件。这源自于以下几个具体判断：（1）自公两党在众议院拥有三分之二绝对多数议席，政权基础较稳固。（2）从理论上说，由于提前大选的决定权在自民党首相手里，政权满届（四年）是有制度保障的。从历史经验来看，1996 年新选举制度启用后的五次大选，平均间隔在三年三个月以上。（3）自、公两党合作历史悠久（15 年），利害相关，“难舍难分”。^① 有分析认为，安倍若要实现其宏大的政治夙愿，就有可能与公明党发生分歧和决裂——特别是 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之后。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那么简单。历史证明，公明党在修宪等原则问题以外的政策灵活性相当大，两党合作自有议价空间。（4）作为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内部的团结度和整合度比民主党高，政策的差异性也较小，其内阁更替不太会引起党与政的过分动荡。（5）即便自公政权产生严重分歧或破裂，安倍“长袖易舞”也有其他选择。其他中小政党难以独立成事，需要依附或配合自民党才能有政策作为，所以自民党比较容易居中操作、为己所用。^②（6）目

① 仅就选举的协作而言，自公两党也是利益相关。小选区是公明党支持自民党，比例区是自民党支持公明党，两党各有所得。

② 其中，联合极右势力是有较高风险的，因为极右势力本来就是“选举乌合”并且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警惕。所以，联“右”作为逼迫公明党作出政策让步的牌来打是可以的，作为现实选择则并非易事。

前,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在议会无法有效牵制自民党,联合其他在野党的“共斗”乏善可陈,7月参议院选举单独过半数的可能性也不大。理论上来说,民主党仍有东山再起的可能性,但一时还威胁不到自民党的统治地位。(7) 7月的参议院选举,自、公两党有望获得过半数议席。2013年2月的民调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在60%以上,认为参议院自公两党议席最好过半数的日本国民占46%,反之占34%,也即并没有发生多数国民认为自公在众议院“过胜”而应加以制约的现象。^① 这表明,虽然选举时日本民众也不满意自民党,但还是希望政权不要过于频繁更迭,要稳定下来造福国民。同时,日本国民认为安倍经济政策可以期待的占49%,相反为32%。^② 此外,“安倍经济学”的短期经济刺激效果已经在逐渐释放出来。总体看来,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大胜和大败的可能性似不太高,中胜和小胜的可能性较大,维持现状和小败为最后。(8) 美国战略“重返”需要一个稳定有力的保守政权。

所以,安倍的半年“试用期”并不难熬,参议院选举或许不是其重返后的最大难关。对安倍来说,难的是长期执政前景中那些结构性的不利因素和棘手问题,例如经济、财政、社保、能源、外交(尤其是与美中)关系等的处理。但退一步说,即便这些问题处理得不好,不良效应充分显现出来并拖垮自民党(包括安倍)政权,那也是需要一定周期的。在经过大选的民意洗礼之后,这个周期,出于惯性运行一般也不会低于两年时间。^③ 这就意味着,中国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需要与立场偏右的典型日本保守政权打交道。

一般而言,保守主义是国内政治概念,保守势力坐大并不等同于一

① 按照政治学原理和日本的选举历史,日本选民往往会进行“牵制投票”,以防止一党过于独大和傲慢。在2005年众议院大选后的2007年参议院选举、2009年众议院大选后的2010年参议院选举中,这种投票行动及其“钟摆效应”都曾经发生过。

② 『朝日新聞』2012年2月2日。

③ 总体说来,自民党有好中差三种执政前景:第一是差的。自公执政业绩很差,经济提振及民生改善效果不很理想,外交失策,自公分裂,其他政党联合逼宫,提前1~2年大选、结果很糟(议席大幅缩减到100席以下)而下台。第二是好的。执政业绩良好(特别是在经济和民生领域),外交顺利,政权稳定团结没有分裂,再加上参议院(单独)过半数的条件,四年后按期大选而没有提前,结果自民党仍是第一大党。第三是中间结果。执政业绩一般,自民党与公明党以及其他政党分分合合,重大政策无法实施,在撑到四年或快到四年的节点被动进入大选,议席减少不太剧烈(保持100席以上)。从中可以看到,即使是最差的前景,政权也应该能维持两年以上。

国的对外政策必然走向右倾化或强硬化。但是，“国家管理权力通过统治阶级思想意识这一中介，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控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① 结合日本的实际而言，当其国内政治结构和政党形态总体保守化程度攀高时，也即“革新阵营”（左翼的社会党、共产党）或自由国际主义的政治势力衰微而对保守势力失去有效牵制时，总保守化对对外政策的宏观影响就会体现在对核心意识和立场带来的偏向上。这就使得日本外交不但首先会重视现实利益考量，也会倾向于推行明显带有意识形态差异化取向的政策，例如亲美同盟和对华“价值观外交”（民主国家联盟）等。

关于前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日美之间的联盟首先是现实利益的驱动和需要，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认同机理，无疑也被日本用作维系和强化同盟的重要精神纽带。这在进入 21 世纪后的小泉、安倍和野田等典型保守政权当道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从 2006 年小泉和小布什发表的《新世纪的日美同盟》联合宣言，一直到 2012 年野田和奥巴马会谈发表的《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共同声明，由自民党和民主党政权达成的每一份日美政治文件都会重点强调共同价值观是两国同盟的基础。其中，从个人政治风格上来说，鸠山和菅直人并不是典型的保守政治家，但这两任政权下问世的同类文件，例如 2010 年《日美安全条约》缔结 50 周年联合宣言和 2011 年日美“2+2”宣言，也都无一例外地高调宣称价值观之于同盟的重要性。可见，总保守化的阴影笼罩着日本政治的上空，安倍新政权将更免不了这个套路。

日本政治总体保守化和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化倾向，为日本政府推行“价值观外交”铺陈了思想和理念基础。日本的外交行为方式也因此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开始在对外关系上以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二是把“价值问题”从“说”的层次系统地落实到“做”上。民主党政权下也曾散发过“价值观外交”的味道，但那主要是野田保守内阁推行的

^①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138 页。

“亚太民主”外交。^① 自民党政权尤其是安倍和麻生内阁则不一样，价值观外交（包括“自由与繁荣之弧”）不但被其作为与经济和安全并立的三大外交支柱，而且还是贯穿日本国际政治和地缘外交的横向轴心。^② 其中的“自由”与“民主”等“普遍价值”，是日本在推动对美同盟、海洋国家联盟、伙伴国家关系构建、经济外交、地区多边安全合作等所有重大外交政策时都要提示的根据和理由。因而，防华的重要动因除了现实利益的考量，保守政权持有的意识形态排斥及价值观歧视则是重要的主观原因。对华包围和牵制的多边外交，是意识形态因素与地缘政治博弈结合的联立方程，这无疑会引发中日之间激烈的外交博弈与国际斗争。2007 年安倍执政时的价值观外交倾向是有目共睹的^③，其 2012 年底上台后在访问东盟三国提出的五项外交原则，第一项仍是“共创相同价值”。在首相就任不久的 2012 年 12 月，他还发表英文文章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这对外华包围的地区外交构想。^④ 可见，安倍非但没有放弃之前的价值观外交思维，而且今后还可能有愈演愈烈之势。

二 右倾化的加剧与对外争端

所谓的政治右倾化^⑤，是日本人描述日本政治倾向和状态的一个政治概念，特指本已占优势的保守政党政治向右翼势力的主张倾斜，使日

① 野田在亚太推行“价值观外交”恐遭冷遇，人民网：<http://japan.people.com.cn/35469/7611874.html>。另外，民主党高层的鸠山由纪夫、枝野幸男、海江田万里等，在自由和人权等议题上对中国有过责难。但这些行为，往往是出于他们个人的“信念”，没有上升为政府的战略方策。

② 价值观外交，除了促使安倍和麻生等推动对华的地缘包围外交，还使得他们以中日互信及战略关系无法成立为由，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贬抑为一种利益交换关系。限于篇幅，本文对此不再详述。

③ 安倍的外交智囊谷内正太郎在 2009 年 1 月的演讲中就公开表示，没有确立自由民主等普遍价值是中国很大的弱点，日本在必要时可以将“价值问题”作为对华的“对抗轴”，这是“很重要很深邃的话题”。参见：『岐路に立つ日米関係：日本外交にとっての米国・中国・アジア』、http://gc.sfc.keio.ac.jp/class/2008_25135/slides/13/。

④ Shinzo Abe, “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Dec. 27, 201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strategic-alliance-for-japan-and-india-by-shinzo-abe>.

⑤ 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右倾化”的定义有时过于宽泛，对于这一在批评日本时甚为“方便”的词汇，往往不免滥用之嫌。“保守化”、“对外强硬”、“民族主义”、“大国志向”、“正常国家化”等概念并不必然与右倾化相关联。

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政策倾向、权力结构和对外影响向右摆和向右看齐，从而总体上使右翼保守势力及其主张在政界占据上风并影响政府决策的一种政治现象或局面。^① 具体而言，它主要是指以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各种右翼保守政治势力为核心，企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并否定战后和平主义思潮、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开展新国家主义教育、推进防华及反华政策、在对外争端上示强逞硬等举措，来实现国家政策右转，并进而达到重塑国家发展模式和国家战略等政治目的的一种政治潮流。^②

日本政治右倾化是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政界总体保守化为背景形成的具有右翼民族主义色彩的一股政治思潮。从各个指标来看，这种右倾化在民主党政权执政后半期尤其是钓鱼岛争端发生和众议院大选举行的 2010~2012 年前后，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民主党内的中道保守和自由主义“势力”日渐萎靡，在对外关系中的发言权被国内右翼保守势力及美国当局所压制和排挤。从鸠山到野田，民主党在国内政治上的保守向右倾向逐渐浓厚，在对外关系上则日益倾向推崇强权和强硬的民族保守主义思维。

在民主党执政的后半期，受到内外困局的刺激，社会整体右转、右翼政党崛起并推动他党靠右行、媒体舆论挺右压左、民众（尤其是青年阶层）支持对外强硬等种种怪相集中发生。^③ 其中，典型的就是“石原慎太郎现象”——在右倾保守化社会舆论环境下，其历史修正、强军修宪、排外和反华的右翼言行越是过激，对外姿态越是强硬，反倒越能够拉票和当选。在 2011 年 12 月 30 日《朝日新闻》进行的全国舆论调查中，石原竟然排在“适合当首相人选”的第一位。日本的政治生态环境进入了“右翼免罪”或“向右不罚”的乱象时代，呈现出右翼语言

① 保守集团内部的自由派与温和派，以宫泽喜一和河野洋平等昔日的政治家为代表，即便不是完全失势，也是几乎不掌握核心决策权。

② 以上概念的界定部分参考了刘江永著《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中的相关内容。此处的“右倾化”，与中国政治术语中的“右倾”是不同的概念。

③ 这些现象可分别对应为：日本民众赞成修宪的比例创历史最高（2012 年 12 月 2 日《读卖新闻》的民调显示，赞成的为 61%，远高于反对的 37%）；太阳党、减税日本（党）、奋起党、日本维新会等右翼政党林立；反对修宪强军的社民党、共产党和日本未来党等左翼政党，在 12 月大选中议席皆减；主流媒体在钓鱼岛争端中同声拥护“国家利益”；青年群体在网络上普遍支持政府对中韩采取强硬政策等。

“官方化”或日本政要语言“右翼化”的现象。其中，日本主要政党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民党在 2011 年 4 月发表的《宪法修改草案》中提出要写入“国防军”和“元首天皇”。在 2012 年 9 月的总裁选举中，安倍等候选人再次提出国防军和历史“修正”等主张。其时，执政党民主党的野田佳彦、前原诚司、长岛昭久、渡边周等当权派人士，多少也都有这样的倾向。日本的如此右倾程度，不但引起了本国有识之士的忧虑^①，更是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不仅是中、韩等邻国，连美俄欧的部分媒体都表示出某种担心。^②

2012 年 12 月 16 日，日本举行众议院大选。选举的结果，竞选纲领充满右倾味道老牌保守政党自民党获得了 294 席的重大胜利。第三极的极右势力集团“日本维新会”获得的议席（54 席）几乎与民主党（57 席）持平，上升为众议院第三大党，中右政党占据了众议院绝大多数议席。由此，右翼集团及偏右势力的影响已无法小觑。相比之下，社民党和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议席一向不振，在议会已几乎失去了政策影响力，处于被日本政坛主流“边缘化”的地位。而且，自民党等还有被抱持过激主张的小型右翼政党进一步“绑架”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日本政治的整体架构和重心都朝着右倾化方向滑落了很多，政治右倾化“正被日本的主流政党和政权以社会化、法制化和政策化的形式转化为民族和国家行为”，^③而这种局面在冷战后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是并未有过的。

正是在这样令人不安的氛围中，日本再次进入“安倍时代”。安倍率领的自民党以囊括众议院近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上台后，已成为“谁也挡不住”的优势大党——如果认为执政盟友公明党阻挡了自己的右倾之路，那么它最终还可以向极右的日本维新会抛出“橄榄枝”。安倍本人在修宪、强军动武、历史认识、领土争端等重要议题上有着这样

① 田中均「国際社会も危惧する日本の右傾化」、2012 年 9 月 19 日、<http://diamond.jp/articles/-/24938>。

② 例如可参见：Chico Harlan, “With China’s rise, Japan shifts to the right”,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1, 2012。Joseph. Nye “Japan’s nationalism is a sign of weakness”,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28, 2012。另据《读卖新闻》2012 年 11 月 19 日报道，同期英国广播公司（BBC）以“Japan has taken a sharp turn to the right”为题做了专题报道，美国《时代》杂志亚洲版在 12 月出版了以“Japan Moves Right”为题的专辑。

③ 张广宇《冷战后日本的新保守主义与政治右倾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 页。

那样典型的错误主张和历史轨迹，属于典型的“带病上岗”，其新内阁的多个重要岗位也被右翼分子和鹰派人物把持。这就造成了本届安倍内阁“右倾化指数”为历届政权之冠的情形。^①日本言论 NPO 的大选结果民调显示，国民的担心事项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对自由主义大幅后退、右倾化不断加重的状况持有危机感”。^②

政治右倾化对日本对外关系的冲击，相当一部分体现在与中韩俄等国的领土及利益争端问题上，并特别集中在与中国之间的钓鱼岛争端上。关于前者，从日本国内政治层面看，其起因是一些日本右翼人物及少数政客利用美国“重返”之机挑起事端，打着捍卫“国家利益”的旗号，纠集起地方和中央的右翼保守势力，企图以对华强硬、制造摩擦来捞取国内选票、凸显右翼势力的存在。其中，特别是一些地方右翼政治人物意图染指外交领域、煽动日本国民情绪，从而达到裹挟媒体和政府、左右日本政治格局和走向的目的。事实是，2012 年中日之间关于钓鱼岛问题的争端，完全是日本挑事在先、中国反制在后，是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姑息、纵容和利用右翼势力，同时不断挑起事端（执

表 2 当前日本三大政党在 2012 年 12 月众议院大选中的竞选纲领（外交安保领域）

	总体外交安全政策主张	涉及钓鱼岛问题等的主张
民主 党 (57 个 议席)	基于专守防卫原则，按照防卫大纲扎实地推动“机动防卫力量”和“重视西南”等的防卫力量建设	扩充海上保安厅等的警戒监视和警备体制，巩固对以“尖阁诸岛”（我钓鱼岛及附属岛屿，下同）为首的领土领海的防卫
	深化作为日本外交安保基轴的日美同盟	
	从大局观点出发加强和亚洲近邻各国的关系	
	继续全力应对朝鲜的核与导弹问题	
	继续做出国际和平贡献	

① 右翼以至极右翼政客在安倍内阁中占据多个职位：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曾反对所谓“自虐史观”以及把“慰安妇”写入历史教科书；行政改革大臣稻田朋美是出名的极右分子，著书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总务大臣新藤义孝在 2012 年 8 月组团“视察”钓鱼岛；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曾反对中国驻日大使馆在东京购买土地建设新馆舍。

② <http://www.genron-npo.net/politics/genre/generaltheory/1226.html>.

自 民 党 (294 个 议席)	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为了坚决保护日本的主权以及领土和领海,扩充海上保安厅的人员、装备和预算
	强化日美同盟,展开保障国家利益的主动外交	
	使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成为可能,制定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	推动研究“领海警备法”
	重新评估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计划,扩充自卫队的人员、装备和预算	强化对“尖阁诸岛”的实际控制,坚决保卫岛屿和领海
	为了与美国新国防战略联动起来强化自卫队的作用和提高威慑力,推动重新评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修宪并据此将自卫队定位为国防军	
	倾注全力尽早解决朝鲜核及导弹问题	
	制定“国际和平合作一般法”	
日 本 维 新会(54 个议席)	基于均势战略来构筑防卫力量	强化实际控制力 = 强化海防力量、废除防卫费占 GDP1% 的框架
	深化日美同盟	
	从相互依存的观点出发研究日本核燃料和武器技术的定位	强化海上保安厅的警备力量,重新审视自卫队武器使用准则
	颁布规定集体自卫权行使和领海统治等的国家安全保障基本法	充分利用国际法院(ICJ),为“尖阁诸岛”在国际法院获得主张的正当性,敦促中国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构筑基于相互依存战略的外交安保战略 = 经济技术依存关系	

意上演了一出“购岛”闹剧)而掀起的风波,从而使中日关系陷入 1972 年复交以来最困难的低谷。

一般而言,领土主权问题是最容易获得民族认同的领域,反复被灌输“固有领土”和“中国威胁”的日本民众,自然容易给予“捍卫主权利益”的右翼强硬政客以认同和支持。在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社会心理充满危机的环境下,钓鱼岛领土争端问题成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激

发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支持其对外民族主义主张的“绝佳”工具。从以上表2可以看到，在2012年日本众议院大选中，跻身前三的主要政党在竞选纲领中都异常地加入针对领土和岛屿（尤其是钓鱼岛）争端的强硬主张。《人民日报》评论文章对此尖锐地指出“右翼政党为了拉选票，比拼对华强硬，有意强化对钓鱼岛的防卫。”^①这是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继“小泉逆流”之后掀起的又一波浊浪。^②野田保守政权不仅没有顶住这波涌浪，反而随波逐流甚至居中利用，和极右势力演出一幕“购岛”闹剧。其中，野田和安倍作为首相还分别于2012年6月和2013年2月，在历任首相中罕见地到冲绳“前线”视察海上保安厅及自卫队基地，激励将士“守土卫国”。中日领土争端问题在一些右翼保守势力的鼓吹和煽动下呈现出不断恶化的遗憾局面。这个局面要比以往的历史问题争端更加棘手，外交回旋余地更小、更难解决。

右倾化对外交关系的冲击，还体现在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上。民主党时代，日本官方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引发太大的风波，但安倍上台后，问题又出现了复活和激化的可能。安倍的历史观在日本政治家群体中属于“极右”的一派，包括否认慰安妇问题的存在、不承认“东京审判”及其判定的日本战犯、推动修改“村山谈话”等。即便在2013年2月的国会发言中，他仍然声称对六年前作为首相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感到“悔恨至极”。^③目前看来，鉴于参拜会引起严重后果，安倍未必真会践行“诺言”。比较可能的是，他将“参拜”作为一张重要的“外交牌”来打，即以表示要参拜作为“压力声明”，而实际以不去参拜作为“交换条件”，使得中方在其他领域做出妥协和让步。即便如此，这种做法也会给中日关系徒增不安和摩擦。

三 “正常国家化”的提速与军事防华

从民主党政权到刚刚成立的安倍内阁，日本政治精英层一贯孜孜以

① 《美国别在钓鱼岛问题上玩火》，《人民日报》2012年12月3日。

② 参见冯昭奎《复交40年：中日关系中的美国因素》，《日本学刊》2012年第5期，第61页。

③ 『朝日新聞』2013年2月7日。

求的国家大战略和政策目标，就是“正常大国化”。这些政治精英层脑里的“正常化”，其话语前提就是“日本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这种“不正常”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政治和安全防卫领域，实际即是日本不甘于没有拥有与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和军事大国地位。为了同这种自我期许的“国家角色”相配套，需要按照新的原则和步骤推动针对国家战略和防卫政策等的调整和变革。进入 21 世纪后，从小泉内阁起，有别于此前中曾根和小泽的大国目标实现路径，日本开始发力将“国防正常化”作为谋求全面大国地位的一环，将军事手段倚为实现正常大国目标的重要政策支柱，使正常国家化中的军事成分与权重大幅跃升。也就是说，现阶段日本为了成为正常国家，最想干的事就是要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并摆脱“战后体制”、成立国防军并获得对外行使武力的权力，当前其具体内涵则是对内体现在对法制、体制和政策的改造和松绑上，对外集中体现在强化军事力量、调整防务部署和松绑军力使用等方面。

民主党在上台之初并没有将“强军立国”作为谋求全面正常大国的主要途径。民主党执政的三年多时间中，从鸠山到野田，其安保防卫政策有一个“从左到右”、逐渐发展的过程。在 2009 年众议院大选的竞选纲领中，民主党甚至都没有正面提出防卫政策设想。到了 2010 年底，经过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酵，民主党制定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其水准被日本媒体誉为不逊于（甚至部分超过）之前自民党制定的大纲草案。到 2012 年大选的竞选纲领时，民主党已经在“涉军”条款中加入了“坚决捍卫主权”、“扎实建设防卫力量”、按照防卫大纲推动“机动防卫力量”和“重视西南”、“参与维护空天海网等国际公地的安全”等内容（参见表 3）。同年，野田内阁又在修改相关法制为太空和核能的军事利用铺路、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构筑独立卫星侦察系统等事关日本防卫原则或政策上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到野田内阁时，民主党在安保政策上已经达到了与自民党相同的水准，两者在这一政策领域可以说基本实现了接轨和趋同。

在 2012 年的众议院大选中，安保防卫政策和领土争端在各党的竞选纲领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表 2 可以看到，位列三甲的自民党、民主党和日本维新会在国家战略、外交安全政策和具体的领土主权争端问题上都染有诸多保守右倾的“军事正常化”色彩。经过大选的

表3 近年民主党三次竞选纲领（外交与安保领域）的比较

	2009 年众议院选举	2010 年参议院选举	2012 年众议院选举
日美关系	构筑紧密且对等的日美关系，日本积极尽责并与美国分担作用。提出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关于驻日美军整编及驻日美军基地的存在方式，也要予以修正。	深化日美同盟。为构筑紧密对等的日美关系，提出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关于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依据日美协议来全力减轻冲绳的负担。	深化作为日本外交安保基轴的日美同盟。扎实执行关于驻日美军整编的日美协议。
日中关系等	全力构筑与中韩等亚洲国家的信赖关系。	谋求中国国防政策透明化，同时加强信赖关系。	从大局观点出发，加强和中韩澳印东南亚等亚洲近邻各国的关系。加强与中国在海洋领域的沟通。扩充海上保安厅等的警戒监视和警备体制，巩固对以“尖阁诸岛”为首的领土领海的防卫。
地区及国际贡献	以推动东亚共同体为目标加强亚洲外交。推动解决朝鲜的核武等问题。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推动反恐与废除核武，开展 PKO 和确保海上运输安全的打击海盗等活动。	推动解决朝鲜的核武等问题、倡议废除核武。与相关国家合作，继续实施自卫队在打击海盗等领域的活动。	推动解决朝鲜的核武等问题。开展共生的亚洲外交。继续做出国际和平贡献。推动废除核武。积极开展与国力相符的国际贡献（PKO、ODA、反海盗等）
防卫政策		以和平国家的基本理念为基础，推进防卫装备品的军民转用。	坚决捍卫主权。扎实建设防卫力量，按照防卫大纲推动“机动防卫力量”和“重视西南”等的防卫建设。参与维护空天海网等国际公地的安全。

催化和集成，以强军为核心的正常化大国理念已经成为一种政策主流范式。

安倍推动“国防正常化”、谋求“军事崛起”的雄心，将比野田显得还要强烈和急迫。某种意义上，安倍的思路和政策就是一个“野田加强版”，而且其推行期间看来比野田可能要长，效果也会更显著。安倍在其政治理念中早就主张日本要摆脱所谓“战后体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尤其是成为一个国防正常国家。安倍在 2012 年 12 月上台后，日本的国防正常化和军事崛起势将由此得到较大的提速和扩容。原因很简单，让日本在自己追求的右倾轨道上成为政治和军事“正常国家”，一直就是安倍坚定不渝的政治信念。此外，他还有诸多的有利实施条件：内部是党内意见比较统一、路线相对一致，执政联盟的公明党起到的牵制作用未必会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①外部是“中国威胁”和“安全危机”被作为持续的刺激因素，以及必不可少的美国的怂恿和松绑。例如，包括 2012 年版在内的三次“阿米蒂奇报告”近乎直白地催促日本在军事方面发挥替美国分担责任甚至权力的正常作用，而当下美国“重返”亟须日本的辅助和支撑，对其谋求修宪、行使集体自卫权、改变防卫基本原则等，完全摆出一副“乐见其成”的姿态。五年前在此“宏图大业”上被迫半途而废的安倍，这次是不会轻易放过到手的有利机会。事实是，安倍在推动修宪和成立国防军、行使集体自卫权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方面，已经急切地迈出了步伐。^②

客观而言，“正常国家化”本身不等于政治右倾化，作为其核心内涵的修宪和拥有“军队”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并不是异常的。^③然

① 公明党对自民党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历史问题、修宪）的右倾化会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但从历史来看，公明党在“正常国家化”和“对外政策”方面，对自民党起到的牵制作用并不很大。过去，公明党对自民党推动成立“周边事态法”和“有事法制”等，都是投了赞成票。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安倍不修宪也可以有足够的政策“作为”空间，比如推动集体自卫权行使和武器使用限制放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设置等。

② 2013 年 2 月 16 日，安倍在自民党集会上再次提出要推动修宪，引起了党内外震动。一般认为，安倍为了政权稳定和 7 月参议院选举，不太会惹起这种不必要的麻烦。之前的 2 月，安倍已启动两个咨询委员会来讨论“集体自卫权”和“国安会”等议题。

③ 例如，同为二战战败国的德国，已经多次修宪并拥有国防军，并没有遭到周边国家的警惕和反对。目前，日本的主流政治学者对日本的“正常化”基本都持赞成态度，但对安倍的右倾化则有不同程度的担心倾向。参见：北岡伸一『安倍首相に問われる政治主導の覚悟』、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www.nippon.com/ja/in-depth/a01701/>。

而，具有特定历史经纬并在右翼思潮和新国家主义引导下的“正常化”，却是不得不令人关注和担心的。日本政治右倾化在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领域的延伸，就体现为一条保守亲美、防范中国、宣扬新国家主义、推动“国防正常”等因素相混合的大国路线。这条路线进一步增加了军事竞争和对抗的因素，在以下两个指向上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冲击，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①

首先，日本将实现正常国家化尤其是国防正常这一目标的外在理由有意置于应对“中国威胁”上。中国国防建设和军力发展以及朝鲜导弹和核问题，被日本右翼鹰派势力用来作为制造危机、树立假想敌、拉拢选民、推动修宪和“国防正常化”的最佳外部因素。日本的媒体舆论、政客言行和政府文件（《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等），从来都不缺乏对“中国威胁”的渲染，尤其是一贯对中国海军的实力和动向持有强烈的警惕和戒备，认为在领土争端加剧的情况下中国就是日本安全防卫的首要对象。日本有意无意地在利用“中国威胁论”来增强军事力量，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安全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由此成为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基调。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2012年3月27日就发表社论声称，近年来日本周边安保局势出现剧烈变化，现行宪法的弊端逐渐显现，日本有必要探讨如何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并拥有相应的应对措施，包括应当起草新的宪法等。钓鱼岛争端不断激化之际，日本的右翼保守势力更是抓住“机遇”，突出渲染这是中国“威胁”、是日本安全的危机，典型的就野田在任时宣示的“忘战必危论”以及安倍首相的“安全危机论”^②。

其次，既然有了“中国威胁”的逻辑起点，那么日本推动“军事正常化”和整军经武的目标自然就是为了针对中国。日本在2010年底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已经提出了关键的“西南防卫”方针与“机动防卫力量”概念。根据这两个核心提法，再对照新《中期防卫力量

① 参见黄大慧《日本大国化趋势与中日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53～258页。

②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在其首相就任新闻发布会上誓言守卫日本领土和领海，强调：“此时此刻，在‘尖阁诸岛’海域，海上保安厅和自卫队的诸君正保卫着日本的海空疆域。日本的安全不是他人的事，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

整備计划》，日本从 2011 起，一是要直接加强西南群岛的军事部署；二是加强自卫队的快速机动能力，能够及时地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展开“北兵南运”，一旦西南“有事”即可动用本土兵力进行驰援；三是配合美军“海空一体战”，推进针对中国的“动态防卫合作”构想。^①

普遍认为，在 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前，安倍会适当“收敛”推动“正常国家化”的步伐。此话的另外一面意思就是，视参议院选举结果，安倍也有可能加快实现其摆脱“战后体制”的夙愿和政治抱负。事态的未来发展究竟如何，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四 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从民主党到自民党的政局变动中，以大选之前后为重要时段，日本的政治持续发生着若干重要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坛总体保守化、政治生态右倾化、国策志向“正常化”等主要特征和趋向上。这些变化的发生，是诸般复杂背景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有国家战略、意识形态、选举制度、国内经济及社会状况等内因，还有美国“重返”、中国崛起、国际及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等外因，以及内外因的相互因应和激荡的效果等。这些变化的持续、扩展和深化，在对外尤其是对华影响上具有不少“负能量”效应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在以下四个领域这种动向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强化“制华”的日美同盟、包围中国的价值观外交和地缘战略、围绕领土争端的文攻武卫、军事崛起与对华防范。这就使得当前中日关系进入并处于一种类似“综合并发症”的时期。

2012 年底安倍实现了自己的“重返”，从两个多月的执政言行来看，他确实执著地持有着某种“反攻倒算”的政治意念。这意味着，

① 以上这些都是按正常计划推进的，随着 2012 年钓鱼岛争端的激化，日本加快了针对西南的政策调整、军事部署、演习训练和装备建设，包括：推动日美针对西南的“动态防卫合作”、购置 AAV7 水陆两用战车、部署第三部 X 波段预警雷达、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利用朝鲜“射星危机”反复演练爱国者Ⅲ型导弹进驻西南岛屿、引进并部署鱼鹰战斗运输机、酝酿成立日本版海军陆战队、提前修改《防卫计划大纲》、部署全球鹰侦察机加强对钓鱼岛监控、海上保安厅增建十艘千吨级巡视船、制定整合陆海空三军力量进行夺岛作战的“综合防卫战略”，甚至包括时隔多年后首次将 2013 年度军费增加 2%，等等。

在民主党后半期“右转”业绩的基础上，安倍的保守右倾化和正常化政策将会持续发酵和推进，以上四个领域的对华负能量效应会被不同程度地放大和加深。作为典型的“现实主义”右翼保守政治家，他似乎并没有想过并相信在他的手上、在这个时代中日之间能够建立起亲睦和互信的真正友好关系，他所想到的只是保持“互惠”而不“战略”的最不坏状态：局部争端不让步但可控、整体关系“正常”以使经济得利，同时以同盟及多边外交总体来看管中国的崛起，这其实就是软硬结合的新版“政经分离”战略。这一战略，根本上是旨在对冲和平抑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势变动，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不论日本哪个政权登台，看来都是难以改变的。因此，中日关系会免不了时或“折腾”，“防坏”不乏动因，但“促好”绝非一时之功。对此，中国也需要“习惯”这一局面，适时调整对日交往方式，包括“促好”要有战略耐心并做长线打算，“防坏”则应抓紧管控、落实“维稳”；同时以“两手对两手”——软对软、硬对硬，边斗争边交往，区别日美，多边对多边，等等。

（责任编辑：李璇夏）

論文要約

アメリカの戦略調整を背景とする日本の 「全面的正常化」の成行について

楊 伯江

アメリカの政策要素と中国の平和台頭は、ともにアジア太平洋地域情勢を動かす二つの大きな独立変数となり、日本の戦略の成り行きとスペースに影響を与える主要な外部要素ともなっている。オバマ政権の「アジア回帰」戦略は当地域におけるパワーゲームを激化させると同時に、日本の戦略転換に重要な機運をもたらしている。2期目に入ったオバマ政権の「リバランスがリバランスされる」という見通し、グローバル化の下で中米・中日関係の両面性及び日米間の利益と立場におけるギャップなど諸要素によって、日本に与える米国の「アジア回帰」戦略の影響の複雑さも増している。日本はアメリカの政策のプラス要因を十分に生かして、「全面的正常化」という戦略転換を推進する一方、自主防衛能力の強化を急ぎ、拡大される「政治的自主」を以って将来に戦略的なスペースをリザーブしていく。

日本の政治変動及びその中日関係への影響

—構造・生態・政策の変化の視点から—

呉 懷中

2012年、日本における政権交代は、政党構造・政治生態・政策傾向という三つの角度から、民主党から自民党への政治変動およびその対外的影響を分析する手がかりを提供してくれた。「構造的総保守化」・「政治生態の右傾化」・「政策の正常化」という核心たる変数の要素から切り込めば、政治体制および安倍自民政権の行く末、対外的政治生態および思想の変化、国家戦略及び政策傾向など日本の政治変動の重要な特徴や趨勢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同時に、このような特徴や趨勢は、相対的に安定する保守政権の主導のもと、「価値観」・現実利益・安全保障などの政策分野において絶えず中日関係に影響と試練をもたらしていることが伺えよう。

地政学と安倍の価値観外交

廉 徳瑰

安倍政権の価値観外交の主な内容は、価値観を絆にして、中国に対して戦略的な包囲網